



昔為意氣郎，今作寂寥翁

游一龍*



強烈的情緒激發狀態往往能將人類的記憶標誌得格外清晰，雖然歷經長久的時間也不至於將其遺忘。我還能記得自己在臺大心理系舊館進行碩士論文口試時的慌亂和答非所問，口試結束後對兩位分別指導我課程和論文的教授心裡充滿了歉疚感，對自己的表現也非常失望。理由很簡單，徐嘉宏教授和梁庚辰教授在那兩年的時光中，其實都已拿出了看家本領，但他們怎麼也料想不到有一天居然需要負責刻鑿我這麼一塊長了腳、老愛往籃球場跑的頑石，更要命的是頑石還生了個吃肉煮酒的愛熱鬧性子。日子久了，他們疲憊

* 國立成功大學行為醫學研究所教授

又難掩失望的眼神，常常輕易地就能浮上我腦門（前額葉），閉上眼一念及此，心頭仍然難免一緊。不過，冥頑固執、難以點化是一回事，但我一直都知道自己是一個具濃重內控（Internal Control）觀的人。我常常想著自己必須承擔起表現不如預期的全部責任，卻也深信自己將來若還有機會，只要能澈底的「洗心革面」，應該還是大有可為的。

役畢後意外地得到陽明醫學院生理學科助教的工作，科主任王錫崗教授是一位非常認真的學者，在他的督導下我「不得不」學會了好多事。王教授一天工作可能超過十六小時，看在眼裡讓我非常震撼。我私下想，我不比王老師的科學基礎，也比不上他很早即懷有研究賀爾蒙學的堅定志向，我竟連體力和毅力都無法和他一比，如此一來讓我有一種強烈的羞恥（Shame and Guilt）感。我開始故意多找些事來做，好讓自己覺得能多負點重。王老師也願意讓我去摸索新購入的實驗儀器及建立測定的方法。短短一年的助教工作結束前，我發現自己居然開始喜歡上作研究這件事，甚至愛上了那種等待實驗結果出來的時刻，因為我急於想知道自己的實驗操作流程做的好不好、對結果的猜測到底對不對。在美國求學期間，自己在實驗工作上的勤快和旺盛的企圖心很快就傳遍心理學系。有一天我連續跳過了早午餐，午後兩點才趕忙去自動販賣機「打」了一罐 Coke，一轉身覺得有些暈眩，索性就蹲在廊下繼續我的補水補糖任務，一位不熟悉的老師路過聽到暈眩一字，立刻去秘書室求援，眾人趕來「救」我的路上，我打遠處就能聽到秘書們七嘴八舌的叫著「…準是 George 那個同時作了三個研究計畫的學生…但他還是得休息呀…」。

不過，求多、求好、求快的強烈企圖也讓我留下了一段羞赧的回憶。至美國滿兩年後，我去神經科學學會（Society for Neuroscience）的年會報告研究結果，Rockefeller 大學的高麗明教授來聽報告。高教授和 Dr. D. W. Pfaff 的大名及他們一系列雌性性行為的經典研究是經由徐嘉宏教授講授的高等生理心理學的介紹而得知，當時即對他們的研究策略心儀不已。高教授聽完我對他們研究的嚮往，很自然的問到我是否已接近畢業，他們那兒不久後就有數個博士後研究員的機會，請我能考慮加入他們。我回到新澤西州即對我的指導教授表明有實驗室邀請我去進行博士後研究一事。我的指導教授聽完先是一愣，他想了一想後對我說：「好，那我們就加快腳步來進行你的博士資格考試及博士論文計畫考試。」我非常感激 Dr. G. C. Wagner 當時對我的容忍、協助和鼓勵。他讓如今也忝為人師的我心悅誠服去體會操作制約學習原則中的



一個重要發現——與其全神貫注的去偵查、即時地去懲罰不好的行為，希望降低那些不好的行為將來再出現的機率，還不如專心致志的去鼓勵一些好的行為，當好的行為出現的機率大增時，相對而言不好的行為出現的機率自然就能降低了。

1997年我至成大任教，在沒有研究生一起工作的頭三年中，我自己去動物中心照養小鼠，連續數天不閤眼不停的以手動操作層析儀，分析腦組織樣本的單胺類神經傳導素及代謝物的量，來進行甲基安非他命造成中樞神經毒性的性別比較研究，並且發表了兩篇到目前為止年平均引用超過五次的文章。任教於醫學院的老師可能會認為我不這麼做也不成，嚴格的升等標準和淘汰制度是解釋我這種彷彿「困獸之鬥」的主因，可是我並非只是一頭掙扎求生的困獸。我知道自己的企圖心所在，我當時自認可以建立一個帕金森氏症罹病率具明顯性別差異的一個病理模型，並藉以進一步去研究許多神經賀爾蒙在此性別差異中的角色，因此即使獨自一人，研究設備及條件並不頂好，我卻能心無旁騖，一往無前。十幾個年頭過去了，從自己後續一個接著一個的研究及其他研究者的報告，累積了對這個甲基安非他命造成單胺類神經毒性模型非常豐富的了解，這些知識顯示我多年前的想法太過於簡化，不過這個聽似殘酷的結論並無損於我這些年在這個模型上的努力，因為兩位亦師亦友的前輩（梁庚辰教授及李志恆教授）多年來持續地給了我一些重要的建議，使我順利掉轉方向深入的探尋該毒物和K他命或酒精合併使用如何造成某些認知能力不可逆轉的損傷及其可能經由的機轉。我並且以實驗結果提出了一個新穎的假說，我認為安非他命及其衍生物在成癮行為發展的心理病理機制可能是以導致現實感解離（Dissociation）的幻覺和尋求現實感解離為主，而非純然是藥物產生的欣快感所致。

在美國東北部羅格斯大學博士班及耶魯大學博士後研究共五年的學習時光，除了大幅提升了對心理學中諸多重要議題的了解，我也盡情的充實英文寫作上的能力和技巧。我在成大任助理教授職後，舉凡研究主題的規劃選擇、主要研究設備技術的建置及拓展、研究團隊的建立，其實皆受益於在這兩所好大學中的所聞所學。美國的研究所有落實的實驗室媒合（Lab Rotation）制度，教授和研究生因興趣、性格的契合度高，所以更能在一起自信且熱情的從事他們的研究工作。美國的教授也多樂意投入時間訓練學生的表達與寫作能力。我在研究成果的發表上遇到的困難較少，除了自己皮厚的

因素外，也因為我在美國共事過的五位指導教授對我的寫作皆有所指導。這是兩樁我認為本地師生都值得一齊去深思的問題。

我從不認為研究的目的是搞運動、組圈圈、弄計畫、爭經費、搶空間，但我認為研究要能有重大的突破、將知識創新、產出具應用價值的發現，一定要具備多向其他專家請教和學習的態度。近年來，我醉心在社會支持如何緩衝壓力造成的神經及認知功能塑性改變的研究及從眾行為的生理機制研究上，獲得了不少珍貴有趣的資料。最初對於這些議題的重要性分析和研究設計的想法得到社會心理學專家程千芳教授的指導很多，研究技術及方法則得自運動生理學專家任卓穎及郭余民教授、焦慮症藥物藥理專家簡伯武教授的協助。最後，我想以標題中白氏詩裡的一句話來速寫出我此刻心中出色研究者應有的行止——踽踽獨行，使勁思考。